



這次於2011年在印尼舉行的第八屆華福大會中，最受矚目的，乃是主題研經講員萊特牧師(Christopher J. H. Wright)的四堂信息。但是，對有些華人牧者和教會領袖來說，「宣教使命」不單單是傳福音領人歸主，還要涵蓋各種的社會關懷——包括社會、生態環境、政治、經濟等等，可能會令他們產生困惑。他們甚至會質疑：這是否偏離了福音派的立場？這是「社會福音」的借屍還魂嗎？再者，教會要如何去實踐呢？

宣教異象的傳承

其實，了解華福會之起源的人都知道，這種「宣教的雙重使命」——即整全的宣教應該包含領人歸主的「福音使命」(Evangelistic Mandate)，以及社會關懷的「文化使命」(Cultural Mandate)——乃是1974年洛桑世界福音大會的總結。這個宣言，是由剛過世的司徒德牧師(Rev. John Stott)所清晰地傳遞出來的。而華福會正是因洛桑大會的異象，由王永信牧師與華人教會眾領袖們所共同創立的。因此，「宣教的雙重使命」不但是華福會的精神，更是普世福音派教會的共同信念。所以，在今年的華福大會上，由司徒德牧師的繼承人——萊特牧師——來傳講這一系列的信息，有承先啟後、繼往開來的意義。

事實上，這種「宣教的雙重使命」在舊約和新約裡都清楚地記載了，萊特牧師的兩本鉅著《宣教的上帝：顛覆世界的宣教釋經學》及《上帝子民的宣教使命》，已由聖經神學的角度，清楚地闡明了這個真理，因此，也就不必再由我在此贅言了。但同時，在教會兩千年歷史中，也有許多聖徒和教會的榜樣，足資我們二十一世紀的華人教會來效法。

例如，中古世紀的修道院——特別是愛爾蘭及英格蘭的修道院，自第六世紀開始，不僅在四、五百年內使歐洲各蠻族先後接受了基督教，他們也為這些蠻族創立了文字(包括哥德文和斯拉夫文)，並抄寫、保存了古希臘和羅馬的哲學及文學著作，向蠻族傳授較先進的農業和醫藥技術，他們更設立了訓練文官的教育體系。換句話說，中古世紀的修道院是集宣教中心、教育中心和文化中心於一爐的。所以，基督教對歐洲社會及文化的影響，才會如此既廣且深的。

此外，十八世紀中，由約翰衛斯理所領導的波瀾壯闊之「福音運動」，也從未將傳福音與社會關懷截然劃分開來。他們在巡迴佈道之外，同時創立了在星期日舉行的識字班——「主日學」、推動廢奴運動、提倡監獄制度改革及勞工法案等等。可見他們所關心的，不僅是個人靈魂的得救而已，他們也關注人們現世生活的改善。不僅如此，衛斯理最

為人稱道的，乃是在教會中推動「班會」組織，來進行扎實的門徒訓練。其中的「小班」(Class)，是由一位資深的信徒來牧養10位左右初信主的慕道友。這位班長的主要職責，除了探訪，就是要考核信徒們的言行，是否與悔改的心相稱。因為這些剛決志的信徒，絕大多數原來是不識字、行為粗暴的礦工、農夫和工人。信主之前，他們的生活充滿了酗酒、賭博、家庭暴力等惡行。所以衛斯理要經過嚴加考核，確定他們結出果子後，才准許他們受洗。事實證明，循道會的信徒們絕大多數循規蹈矩，令人刮目相看，社會風氣也為之煥然一新。

因此，從教會歷史的角度看來，直到十九世紀為止，福音使命與文化使命一向是攜手並進的。而兩者之分道揚鑣，則是十九世紀末才開始的現象。當時由於理性主義的衝擊，歐洲大陸的自由神學家們否定了聖經權威性，也失去了對永恆天國的期望，因此轉而以西方社會為模型，推動亞、非等「落後國家」走向全盤西化，以為如此就可以建立「地上樂園」；這就是「社會福音派」的起源。但仍堅守聖經權威性的信徒們，則在保守派教會領袖的領導下，產生了與之抗衡的「基要派」。為了與社會福音派劃清界線，基要派領袖們強調拯救靈魂的優先性。但可惜的是，這卻導致輕忽了教會的社會責任。

二次大戰後，一些基要派的教會領袖及神學家，包括卡爾亨利(Carl Henry)及司徒德，在反省之後，希望引導教會回歸到更平衡的正軌，乃先後在柏林及洛桑兩次世界福音大會上，提出這種「宣教的雙重使命」之觀點。凡認同此觀點的教會和信徒們，就被稱為「福音派」，以示與傳統的基要派有所區別。然而迄今，在普世華人教會中——包括中國家庭教會，可能有很多仍停留在基要派的狹隘觀念中，才會產生這次華福大會的困惑與爭議。

總之，無論從聖經或從歷史的角度來看，二十一世紀的華人教會，都應該走出這個誤區，而邁向真正整全的宣教使命。

宣教使命之實踐原則

雖然很多人能夠認同這種「宣教的雙重使命」

的概念，然而在實踐上，卻往往在抉擇上陷入兩難的困境。舉例來說：基督徒應該參與「占領華爾街」運動嗎？應該推動反核嗎？在全國大選時教會應該選邊站嗎？教會要花多少人力與財力投入扶貧、賑災或生態保護呢？總之，要維持宣教之雙重使命的平衡，往往是「知易行難」。所以，我們仍得釐清兩者之間的微妙關係，才能在付諸實踐時，找到適當的着力點與平衡點。

1. 「福音使命」是收割，「文化使命」則是鬆土、培土與撒種的工作。

在《預約心靈沃土》一書中，作者唐斯(Tim Downs)曾將「福音使命」比喻為收割，而「文化使命」則是鬆土、培土與撒種的工作。換句話說，「文化使命」是一種福音預工，預備人心來領受福音。唐斯提醒我們，「收割和撒種並不是彼此衝突的傳福音方式，互別苗頭，而是兩種互補的角色，各有各的重點與作法。」而且，惟有先流淚撒種，之後才可能歡呼收割。但是今日教會往往急功好利，炒短線；不先耕耘，卻期待好收成。例如，許多教會熱衷於花錢組織短宣隊，卻不太積極支持長期的宣教士；所推動的「短宣」活動往往也偏重於蜻蜓點水式的參訪活動，而非長期耕耘的工作。唐斯提醒我們：「好土」是需要花代價與時間去預備的，有的土壤需要調整酸鹼度，有的土地要去掉地底下的石頭，也有的土壤需要加肥料等等。這些都可以作為我們擬定福音策略時的參考。

2. 文化使命是「治標」的，福音使命才是「治本」的，但是兩者必須配搭。

從聖經的啟示來看，我們必須認清：文化使命只是「治標」的手段，而福音使命才是「治本」的。然而我們也必須「標本兼治」，甚至有時還得先治標，然後才能治本。正如救護車上的急救人員，通常只為傷者先做止血及固定骨折等治標的工作，但是這些治標的手段，卻能爭取到寶貴的時間，使患者有機會送去醫院進行開刀等治本的治療工作。因此，治標的手段往往反而有時間上的優先性，而治本的功夫則具有長效性。兩者應該是相輔

相承的，而不是「非此即彼」(Either/Or)的選項。所以，我們不應該忽視文化使命——社會關懷——的關鍵性作用。

3. 福音使命所帶來的質變與量變，是文化使命成功的基礎。

奧古斯丁、加爾文、衛斯理以及歷代福音派領袖們都強調，文化雖是墮落的，卻是可以被轉變的，甚至有可能藉著神的大能及恩典被更新。舊約先知們苦心孤詣的呼喚，以及耶穌提醒門徒們是世上的光和鹽，正是不斷地提醒世人：神既關心個人的得救，也期待文化和社會風氣的更新。因此，我們在這個墮落的世界中，有特定的角色與責任。同時這也表明，經由我們的影響，這個世界及其上的文化，有可能被轉化。耶穌又曾以「麵酵」為例，來說明信徒對社會的影響(太十三33-35)。信徒在社會中，就好比少量的麵酵在麵團中，但是這些麵酵卻能使整個麵團都發起來了。也就是說，每一位信徒都該是能催化整個社會更新的「麵酵」。然而，文化更新及社會改革能否成功，常常取決於社會上是否有數量夠多、素質夠好的真信徒。但這就有賴於傳福音的事工，以及紮實的門徒訓練。可見福音使命必須與文化使命齊頭並進，才能發揮相輔相成的「加乘效果」(Synergy)。

文化宣教使命之行動

從信徒個人與教會整體的觀點來看，社會關懷的文化使命是有多種選擇性的。也就是說，每個教會和基督徒，要依據他們的恩賜、呼召、可用資源及環境背景，來決定他們想要投入社會關懷的領域及力度。每個地區的基督徒和教會，都應該依據特定的需要，選擇某些社會問題作為關注點。

這次華福會上萊特牧師的信息中，一個爭論點是關於生態與環保方面的。他認為，既然我們是神的管家，被賦予責任照管神所創造的世界，那麼「生態事工」(Ecological mission)也應該是廣義之宣教的一環。對大多數華人基督徒而言，生態保護也列為宣教，可能是太「先進」的觀念。但是反過來說，大多數基督徒可能會支持資源回收、防止污

染、節約能源、鼓勵開發再生能源等措施。

所以，問題不應該是：「生態保護是否該列為宣教之一環？」，而是「我們在甚麼地區？該投入多少力量？要優先做甚麼？」的問題。譬如，在巴西亞馬遜河原始森林的開發問題，不僅是生態保護問題，同時也是印地安族原住民的生存問題，所以應該列為優先投入的項目。但是在北非蘇丹和衣索匹亞(埃塞俄比亞)，可能賑災濟貧比生態問題更優先、更迫切。在中國，河流及土壤污染問題，已經到了「今天不做，明天會後悔」的地步，應該受到重視。有一些適當地將社會關懷與福音事工相結合的範例如下：

台灣的工業福音團契這些年相當關注數十萬的外勞及外籍新娘，他們除了愛心關懷之外，也提供法律的支援、語言的課程等。這些年來，他們已經帶領許多印尼的穆斯林，以及佛教背景的泰勞信主。

在芝加哥的太平洋花園事工(Pacific Garden Mission)，一百多年來一直在作都市窮人和流浪漢的事工。他們除了提供庇護所及免費飯食之外，也有個別的查經及門徒訓練。因此，許多原來的流浪漢，如今成為他們的同工，整個生命完全轉變過來。

國際憐憫事工(Compassion International)在世界各地從事貧窮地區的兒童補助事工，但他們堅持，除了提供營養費及學費補助之外，這些孩子們也必須持續地去教會，使他們在屬靈上也同時得到餵養。因此，他們所幫助的孩子們，與其他的慈善機構比起來，長期的果效是非常明顯的。

總之，基督信仰對這個世界所能提供的，並不是一套固定不變之文化的、政治的、經濟的外在規範或制度，而是提供「新人類」。這些「新人類」由於在信仰上被更新，對人生有了新的透視與領悟。所以，透過他們，更公正、更合乎人性的經濟和政治方案可以被提出來，更優美的文化及生活環境也可以被創造出來。藉此，我們得以服侍我們這一世代的人。

(作者為美國真光協會創辦人)